

媒体声音与社会发展

——反思媒体在社会发展新阶段的作用

史佳*

摘要：面对当今中国高速发展的经济，不断出现的各种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民众对社会公平、司法公正、政务透明和民主清廉政治的呼声日益强烈，无不反映出普遍存在的社会道德严重缺失，已经严重损害了公众对社会的信心，物质主义泛滥和精神道德教育滞后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障碍。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新问题和近年来全球化形势在各领域的急剧发展变化，使得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中国媒体功能和作用。然而，中国主流媒体一向被定位为“党和人民的喉舌”，加之媒体市场化运作，使中国媒体在双轨并行的体制下，出现主次功能错位，没能发挥媒体公众道德教育和价值引导的作用。本文从社会发展角度对中国主流媒体定位和功能进行反思，针对社会发展之需求和媒体当前必须承担的使命等方面进行阐述，探讨主流媒体应该用怎样的价值观来引领我们当今社会的道德重建，以及媒体在社会精神道德重建的实践中将面临的挑战。

关键词：媒体功能 道德重建 价值观 人类本质 社会发展

一 “坏消息”背后是什么？

现代科技的发展成为媒体网络世界的强有力支撑，每天媒体向全球各个角落传递的信息让我们感到它就像另外一种空气。但是，人们注意到这个世界的坏消息越来越多，几乎让人窒息。2008年7月3日的香港《文汇报》刊文：如果你每天读报，你会发现我们如今正处在一个与坏消息作斗争的时代。每天面对这些新闻，意味着在这个充满现代性的世界里，我们不仅需要与自己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坏消息做抗争，还需要与各种媒体中的坏消息做抗争。2009年4月，一位中国网民这样描述：……一早打开电脑，发现十之八九竟然都可以归入坏消息的行列，……这些新闻越演越烈，每天占据各大新闻网站版面的大幅位置。这些负面消息越来越多，我们的社会究竟还有多少承载能力，我们老百姓的心理防线究竟会不会有朝一日崩溃掉？¹

是媒体对报道灾难性的坏消息过于乐此不疲，还是这个世界已经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

首先要明白的是，媒体传出的让人忧虑不安的信息都发生在我们这个现实世界。它无不折射着物质主义和消费享乐主义盛行，媒体低俗娱乐和非人化、拜金主义渗透到了相当多人的灵魂。近年来所发生的一切灾难性事件，如地震、洪水、海啸、食品安全危机、社会道德缺失、官员腐败、商家制假贩假、一些地方“带血”的GDP、不断增加的“癌症村”、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频繁的社会暴力事件、警察和司法人员违法犯法和侵害人权、商界麦道夫式的骗局、全球金融危机、疫病传播、恐怖主义威胁、新的区域冲突、跨国违法犯罪活动等，无不印证着一百多年前巴哈欧拉的预言：“绝望之风从四面八方吹来，分裂和折磨人类的争斗与日俱增。突变震撼和天下大乱已迫在眉睫，而现行的制度却显得可悲的无能。”² 越来越多的人在思索这一系列现象背后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个世界究竟怎么了？2009年的热门哲学书籍《黑天鹅》一书作者塔雷伯（Nassim Nicholas Taleb）描述了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人类思维已赶不上这个变幻的世界，人类对于未来的先知先觉如此无力，也因此而恐慌

* 史佳，昆明人民广播电台新闻中心副总监、英国伦敦城市大学国际传播硕士。

¹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06/1/107699.shtml>

² 转引自《谁在书写我们的未来——巴哈伊全球愿景》，澳门：新纪元国际出版社，2009，第4页。

不已。“错把对过去的观察当成未来的代表，是我们无法了解黑天鹅事件的主因。”

2008年，在金融、经济、政治等领域发生了一系列被认为“不可能发生的事”。这些事件带给人们心理的冲击，并不亚于当时的人们见到“永不沉没”的泰坦尼克号葬身海底。阿博都巴哈在1907年这样阐述：“灾难的背后有更深层的原因。它们的目的是教育人类。我们生活在一个极端依赖物质条件的时代，人们想象着一只庞大的巨轮，完美的机械，高超的舵手能带来安全。但灾难告诉我们，上帝才是真正的保护者。如果上帝的意愿是保护我们，一个小小的舢板，也可以逃离灾难。相反，一艘完美的巨轮和优秀的舵手也无法躲避灾难。³ 在世界飞速发展的过程中，更需要以一种联系着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全景式”的眼光来审视人类社会文明裂变的历史和愿景。

追溯人类社会发​​展轨迹，不难看到人类已经从早期的部落、阶级、城邦发展到国家。到了我们这个世纪，它已经开始超越国家地缘和政治界限，地球变成了一个整体，生活在其间的人们互相依存和关联性越来越强，美国气象学家爱德华·罗伦茨（Edward Lorenz）用“蝴蝶效应”（The Butterfly Effect）来描述这种关联性，蝴蝶在热带轻轻扇动一下翅膀，遥远的国家就可能造成一场飓风。这现象让人们不敢小视发生在地球任何一个角落的事件可能带来多米诺骨牌式的影响。“目前整个世界的混乱局面和人类事务的不幸状况，乃是人类最终和无可避免地在全​​球范围内统一于一个单一的社会秩序的有机进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人类，作为一个独特的有机体，已经过了类似其个人成员生命中的婴儿期和儿童期的演变阶段，现在正处于骚动不安的青春期的最高峰，即将进入它期待已久的成年期。全球一体化的进程，在商业、金融和通讯领域中已成现实，在政治舞台上初具形态。”⁴ 历史上突发的灾难性事件只是加速了这一进程。“不久，今日的世界体制将被席卷起来，一个新的体制将代之而展现开来。”⁵ 目前的社会状况是消极而令人不安的，但这是人类世界发展进程中不可避免的“破坏—整合”过程，它们有助于人们解除那些阻碍人类进入新社会的桎梏。⁶ 我们正在迈入“人类一家”时代的门槛。

遗憾的是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当今大众传媒却没有全面客观地反映社会深刻变化的本质和人类发展的趋势，没能帮助人们正确理解转型阶段各种问题的意义，为走向光明的未来做好准备，反而越来越在商业化的世界中迷失，误导公众的状况日益严重。我们很有必要对媒体环境和媒体现状有一个清醒认识，反思媒体如何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怎样承担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使命，而不致使媒体和这个社会一起沦为物质世界的牟利工具和牺牲品。

二 取舍之间的媒体现实

2006年10月24日新华网刊文描述中国媒体现状：短短几年，中国媒体呈现出无赖化和独立思考缺失的状况，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自我放纵，集体无意识冷漠，浮躁以及互相模仿，纷纷拜倒在浮华与陆离的裙裾之下，严肃深度报道节目要么消亡，要么被扭曲为娱乐快餐样式。从整体数量上观察，三大类内容占据着媒体的主要位置：第一类，打着“民生”旗号的实用性新闻，热衷于迎合和满足受众低层次的感官需求，毫无顾忌地渲染社会的无道德意识，凶杀暴力情色、“八卦”、选秀、“山寨”、“恶搞”等内容，这些被标榜为“看点”和“眼球经济”；第二类，极力鼓动各种过度物质消费的泛商业化内容；第三类，是“八股”化的政府指令性报道，一边倒式的“正面宣传”多半演变为一方官员“政绩工程”的见

³ ‘Abdu’l-Bahá. The Promulgation of Universal Peace, Talks Delivered by ‘Abdu’l-Bahá during His Visit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in 1912, Wilmette, Illinois: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2007. p.65.

⁴ 《所有国家的转折点》，澳门：新纪元国际出版社，1997，第5页。

⁵ 转引自《谁在书写我们的未来——巴哈伊全球愿景》，澳门：新纪元国际出版社，2009，第72页。

⁶ 《道德教育》，澳门：新纪元国际出版社，2004，第63页。

证。如此情形下，媒体对社会发展的切要问题鲜有涉及，更缺乏关于人类精神信仰和共同价值的构建和相关的整体行动。面对整个社会由于信仰和道德缺失所致的严重后果，尽管人们疾呼道德重建和社会公平和公正等等。但是，媒体并没有因此发出回应之声。这种“有为，有所不为”的取舍，折射的是现今的社会价值观。

根据传播学议程设置理论，新闻媒体并非百分百地反映世界本来面目，而是具有议程设置的功能，即有选择性地对事实进行报道。⁷ 媒体是依照自己的价值观，对客观事实进行取舍，选出被认为是“有价值”的部分，或重要的部分，进行采编处理，然后计划好的时间提供给公众。换句话说，就是媒体也许不能直接告诉公众“怎么想”，但是却可以影响受众“想什么”。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不在于它如何影响公众对某个具体事件的看法，而在于通过所提供的信息及提供信息的方式，告诉公众什么是重要的，应给予关注，什么是不重要的，不必给予重视。”⁸ 那么，媒体现在的价值观是什么？又是什么因素在影响着议程设置，并导致了媒体目前的状况？

实际上，媒体背后是权力和利益之手在发挥着作用，换言之，就是媒体体制和环境。中国主流媒体定位是：“党和人民的喉舌”。近年来，媒体对“人民的喉舌”功能的认识得到加强，媒体承担起舆论监督的任务。媒体定位侧重点的变化，成为改革开放过程中媒体发展的一大亮点，媒体本身已经成为整个社会发展链条中的重要一环，深刻影响着时代的进程。政府和媒体业界对媒体作用的认识也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势不断变化，在媒体是党的“喉舌”基调上，增加了“政府与民众沟通的桥梁”说，媒体“社会公器”论等。这些都是在这些年中国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背景下产生的变化。但是，中国主流媒体目前是仍属于政府宣传部门领导下的事业单位，同时又实行企业化运作，换言之，它既有意识形态属性，又有信息产业属性。作为一种产业，媒体不可避免地要遵循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而运作，优胜劣汰的规则使媒体不得不面对激烈的竞争。在媒体产业的三方参与者——政府、媒体、受众之间，媒体处于中间的位置，它既要服从党委政府的管理，又要受媒体受众的制约，两者都要兼顾，媒体必然会选择在政府管制和商业利益之间进行某种动态平衡，最后牺牲的还是媒体的公信力和广大民众的利益。由此，也就导致媒体社会功能弱化。作为大众媒体而言，本应该具有社会环境监测的作用，社会公众通过媒体的信息可以获知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风险程度。但在市场竞争环境下，媒体多是漠然肤浅地反映社会变化的表象，缺乏对社会深层问题的判断分析，对眼前急迫关键的社会问题缺乏敏感以及深入关注，有些报道甚至是对社会现实的遮掩和歪曲。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事实是：目前，人们对社会各层面的道德缺失痛心疾首，而政府呼吁或通过行政手段开展的道德教育在执行过程中往往流于形式和口号，难以真正落实。媒体本身在职业道德和公众道德教育方面也没有进行认真反思，反而在泛商业化的运作中极大地消解了媒体的社会责任。无论是一枝独秀的媒体，还是组合成集团的媒体群，其决策和管理高层无不用“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来描述其发展方向。实际上，“社会效益”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很难有一个清晰的衡量标准，但“经济效益”可用广告创收和附加值产品收入的数字明确体现。中国媒体广告市场在2002年的业绩已不少于1000亿元，传媒业利税超过烟草业，成为国内第四支柱产业。据AC尼尔森发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2008年中国三大传统媒介（电视、报纸、杂志）的广告市场收益总额为5203亿元，比2007年增长了17%，这一增幅比2007年提高了2%。而如果加上网络与广播媒介，整个中国广告业的业绩增幅则为21%。⁹ 无论是政府高层，还是媒体决策者显然都意识到媒体已经成为GDP新的增长点。新闻

⁷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第215页。

⁸ 刘继南：《大众传播与国际关系》，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第193页。

⁹ <http://www.yxad.com/Article/HTML/50383.shtml>

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在谈到文化体制改革时强调，“长期以来，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的资源配置都是按照行政关系，违背了市场的规律，现在迫切需要打破这种布局，按照产业发展规律重新布局。……你占领的市场越多，你的意识形态的阵地越巩固。”¹⁰ 媒体的产业规模和盈利能力无疑被放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那么，在一个以经济为主导的媒体发展框架中，社会精神文明的发展和公众精神信仰需求又将会有多大的空间呢？

三 倒置错位的媒体功能

巴哈欧拉说过，媒体“诚是世界之明镜。它们反映了各民族的善与追求。报纸既反映其现况亦使其闻名。它们是赋有听觉、视觉与言辞能力之明镜。……然而，报章之作者应该排除煽情与邪欲之动机，而以正义与公平之外袍加身。”¹¹

纵观现代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和整个社会的千变万化，媒体形式呈现多元化和交互重叠，媒体理论也在不断发展翻新。总体而言，媒体的社会功能和作用基本可以归结为以下模式，它主要体现媒体在社会发展中应该起到的作用。



图1 媒体社会功能图

现代通信和传播技术的发展使媒体功能越来越多，但如图所示，其主要功能并不是娱乐消遣，而是信息沟通、社会公信力、社会协调和动员，公众教育和道德引导，以及社会文化价值延续，这些都体现着媒体的核心价值——社会责任。但我们看到的情况却是媒体主次功能倒置失衡，媒体越来越成为赚钱机器和牟利工具。这实际上是媒体价值观的直接体现，也是人类精神信仰在物质世界迷失的反映。而主流媒体的现状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主导思想以及整个大环境息息相关。2003年，中国内地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进入一个关键的发展阶段。当人均GDP从1000美元发展到3000美元阶段，资源和能源日益紧张，社会经济发展失衡，贫富差距拉大，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剧增，社会道德精神也在各个层面土崩瓦解。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和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经济活动性质的转变使社会风险不断扩大和加深，对经济与社会的安全基础都形成了极大的侵蚀；……人们习惯于用利益博弈模式来理解和处理人际关系，而疏于培育价值认同、相互信任、资源共享的意愿和能力，因而公共精神和分享生活的兴趣日益流失，这对于社会合作过程权利义务的履行都形成了破坏性影响。¹² 如不妥善处理这些问题，极易引发社会动荡。2005年，中国政府提出建设“和谐社会”，2008年针对

¹⁰ [http:// news.sina.com.cn/c/2009-08-28/225318533935.shtml](http://news.sina.com.cn/c/2009-08-28/225318533935.shtml)

¹¹ Bahá'u'lláh, *Tablets of Bahá'u'lláh*, Wilmette :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1988. p.39.

¹² 郑杭生，http://lw.china-b.com/zxsh/20090302/495144_1.html

中国GDP持续增长，社会矛盾和问题错综复杂，整个社会所遇到巨大挑战和考验，中国政府又提出“科学发展观”理论，强调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在此背景下，媒体的舆论监督环境有所变化，为了缓解社会矛盾导致的民众对政府的对抗情绪，政府把媒介纳入权力运作体系，把媒介变成有限的公共资源，加强政府与民众的沟通互动。但是，这些调整措施只是涉及问题表层，而社会机体和人们精神道德上的深层病症，以及公众信仰缺失状况仍然没有解决。媒体本来就不仅仅是单纯的经济因素，或是政府行政管理的辅助手段，它还承担着意识形态和精神道德的使命。中国人自古就注重“破”与“立”的关系，但关键的问题是，媒体在披露曝光坏事物和抵制媒体低俗之风，也就是“破”的同时，并没有真正“立”起值得赞颂和持久传承的人类社会共同价值，更没有帮助人们探寻和建立适应这个时代的精神信仰和道德。症结点就在于，我们是以物质化方式去思考问题和制定发展计划，无论政府还是媒体，一直把经济手段视为解决问题的“万灵丹”，认为只要实现经济富足，让更多的人获得经济利益，社会矛盾和冲突就会减少。而对人们精神信仰的真空和公共道德问题，要么置若罔闻，要么讳疾忌医。2008年的金融危机再次让人们警醒：金融危机的背后实际是道德危机，如若再不加以解决，人类社会的发展将最终落空，甚至面临社会信心全面崩溃。经济发展不能填补精神信仰缺失的空白。同理，对中国而言，GDP不能解决社会道德堕落的问题。作为社会舆情的“瞭望者”，和现实“鉴镜”的媒体，在报道坏消息甚至放大负面信息时，是否也曾想过自己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是什么？如何发挥媒体重要的教育功能，正确引导公众，构建社会道德，推动社会文明和公众灵性发展？怎样用全新的模式处理协调媒体与政府、公众、以及其他团体之间的关系，真正体现社会总动员的作用？巴哈欧拉早就明确指出：“人人生来是为了推动文明不断进步的。……人若表现出如荒野禽兽一般便丧失了其存在的价值。”¹³ 物质的满足并不能提高人的精神境界，我们只有同时促进精神和物质两方面，才能达成真正的进步。

四 用什么价值观引领这个时代？

巴哈欧强调，“患时代之所需，虑时代之所急。”¹⁴

当全球化将所有这个地球上生活的人们联系在一起时，我们就已经迈进了“人类一家”的门槛，这个时代需要的是一个更符合当今社会文明发展进步的价值观来引导精神道德的重新构建。那又是什么呢？

当今世界芸芸众生为自己的既得利益竞争博弈，除了由于物质化大环境的影响外，还反映出人们对于人的本质的理解问题。实际上“人处于物质的最高级和灵性的最初级——亦即，他是不完美的终点和完美的起点，他处在黑暗的终结和光明的初始，以致于有言道：人的情形有如夜之末、昼之初，意思是他具有所有不同层次的缺憾，并拥有各种程度的完美。”¹⁵

“人有两种本性：一种是精神的或较高尚的本性，另一种是物质的或较低下的本性。前者使他接近上帝，后者使他只为俗世利益而生活。这两种本性的各自特征都可以在人类身上发现。人的物质本性所表现出的是虚伪、残忍和不义；这些均出自其较低下的本性。而人的神圣本性所表现出的则是爱、宽恕、善良、真诚和公正。这些都是较高尚本性的表达。”¹⁶ 当今人类价值观和道德体系的重建，旨在让人类天使的一面战胜动物的一面，激发出上帝赋予人类的永恒灵性力量。这也理应成为主流媒体思考、探索和努力的方向。巴哈欧拉有过这样的忠

¹³ Bahá'u'lláh. *Gleanings from the Writings of Bahá'u'lláh*, CIX, Wilmette: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1976. p.215.

¹⁴ 转引自《挺身服务》，澳门：新纪元国际出版社，2008，第二次印刷，第34页。

¹⁵ 阿博都巴哈：《巴答之问》，澳门：新纪元国际出版社，2000，2004年印刷，第213页。

¹⁶ 阿博都巴哈：《巴黎谈话》，澳门：新纪元国际出版社，2009，第44页。

告：除非人类的团结能稳固地建立起来，全人类的幸福、和平与安全是不可能达到的。

在这样一个充满错综复杂的矛盾和问题的全球化社会发展阶段，首先应该树立的是“人类一家”意识，“地球乃一国，人类皆其民”是对这个时代发展的确切描述，也是让所有社会成员树立人类是一个有机整体的全球性思维，共同参与和承担人类社会发展责任的思想基础。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就认为，我们面临的“现代风险确实已经展现出一种全球在地化（Glocal Risk）趋势，风险既是地区性的，也是全球性的，我们必须要求自己有一个世界主义的视角，要求自己超越自己民族国家的前提性假设。”¹⁷ 那种“独扫自家门前雪”和区域性解决方案已经成为治标不治本的典型。巴哈欧拉明确指出：“全世界人民，无论种族或宗教，皆自同一个神圣源泉汲取灵感，皆为同一个上帝的子民。”¹⁸ 人类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任何一个部分都有不可取代的作用，都不可分割，人们必须消除各种国家、种族、政治、宗教、文化、性别、历史和传统的偏见，以开阔的胸襟和全球的视野来看待今天的世界，解决人类的问题。社会发展中各种问题的全球化在不断提醒我们：任何一个地方，或一个民族的灾难，也是全人类的灾难，各国各民族间越来越密切的相互依存，使当今世界体系变得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危机迫使大家必须团结起来，共同应对才有可能寻得出路。正如巴哈欧拉告诫的，“唯有且直到牢固地建立团结，人类才有望享得福祉、和平与安全。”

第二，必须在每一个社会成员心中牢固树立公平和正义的道德标尺。这也是我们的广大民众最急迫的呼声。“‘正义和公平是看守人类的一对监护神’……它是保障每个人和每个团体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潜能的依据所在。……唯有真正地履行正义，才能够在人民、文化和组织之间建立诚信。”¹⁹ 现今世界的很多问题之根源，就在于公平正义没有得到实现，社会发展的成果没能为大多数的人服务，而是被少数人或集团垄断。如果我们将人类视为一个有机整体的话，其管理机构所履行的权威，实际上是一种托管关系而非拥有关系。每个社会成员对于整个人类而言就是一种信托。每个人都应该有机会参与社会发展，并为塑造美好未来做出贡献。因此，社会文明发展计划和行动就决不能只是政府、社会机构、权力集团、社会精英等的专利，它一定得是所有社会成员都参与的公共行为。

第三，以磋商的方式体现集体意志，以灵性方式解决社会经济问题，以确保社会的公平公正。磋商是一种平等权利的体现，是社会成员之间相互尊重的表达，更是解决诸多问题的有效方式，尤其是涉及公共利益的事务。磋商能避免人们痛恨的专权、腐败和不公现象的出现，最大程度保障公众的利益。巴哈欧拉明确指出“磋商有助于明达事理，化推测为确知。在黑暗的世界里，磋商是一盏指路明灯，因为那里的一切事物都有待完善和成熟。天赋理解力通过磋商才能成熟起来。”²⁰

第四，树立科技与宗教同步发展观。人们一直认为只有科技能引领人类走向未来，但是，如果突飞猛进的科技成果被以无道德的方式使用时，就可能成为毁灭人类和世界的武器。环境污染、食品安全危机、新疫病的出现、全球变暖等等，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科技背后的风险和隐患。客观地说，科技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工具，但是如何明智地使用它，则需要道德来掌控。阿博都巴哈指出：“宗教和科学是人类的智慧得以凌空翱翔的两只翅膀，有了它们，人的心灵就能进步。单靠一只翅膀是飞不起来的！倘若只用宗教之翼去飞，就会很快堕入迷信

¹⁷ 《凤凰周刊》总第344期，第90页。

¹⁸ 转引自《挺身服务》，澳门：新纪元国际出版社，2008，第二次印刷，第28页。

¹⁹ 转引自《谁在书写我们的未来——巴哈伊全球愿景》，澳门：新纪元国际出版社，2009，第88页。

²⁰ 转引自《谁在书写我们的未来——巴哈伊全球愿景》，澳门：新纪元国际出版社，2009，第19-20页。

的深渊。倘若只用科学之翼去飞,不仅同样不能进步,反而还会栽进唯物主义的绝望泥潭。”²¹ 科学和宗教必须同步发展,这个世界才能规避风险,得到健全和谐的发展。

第五,道德重建需要有灵性力量指引。以往提出的道德教育,无论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之所以没有产生深入人心和改变社会的结果,是由于它没有灵性力量的指引和支撑。传统的道德教育观没能与当今世界发展的需求接轨,而不少现代道德倡议和计划由于缺乏灵性原则引导,也难以落实或持久。人的本质是灵性的,生命的目的就是发展各种美德和灵性品质,如可靠、诚实、怜悯、宽容、忠诚、慷慨、谦虚、无私、公正等,旨在推动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而这种道德重建是必须有来自宗教的智慧和灵性力量来引导,否则它很难在物质化的世界中获得成功。“宗教是人类的创造者向人类启示的神圣训言和律法。……一旦人类企图更改这些规则以适合自己需要时,它们就不成其为宗教,而变成了表现人类所有缺点和局限的工具了。”²² 而道德重建的重点应该放在年轻一代的教育,因为“人就好比富矿,隐含无价珍藏,惟教育能掘而显之,使人类从中获益。”只有当人们的道德灵性品质与物质同步发展了,社会文明才可能在和谐中真正进步,人类福祉才能实现。

五 关于媒体实践的初步想法

首先,媒体当务之急是发挥灵性原则指导下的教育公众的作用,重建媒体公信力,承担起人类社会道德重建的重任。在媒体日益多元化的前提下,很有必要开辟和扩大媒体的公益空间,可以考虑尝试一部分公益节目或公益性版面,有系统地介绍新价值观和道德准则,吸引社会各界人士和公众对灵性品质和道德问题的关注、思考和讨论,借此对社会各群体进行美德教育。同时,也让人们了解人类社会发展与个体的关系,正确理解世界变化的真正意义,逐渐明确个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其次,关注那些对社会文明发展有影响和有意义的事件,尽可能全面客观报道,最大程度地为社会创造公平正义的舆论环境,充分发挥媒体权力监督和舆情瞭望的作用,促进政府在公共事务中的清廉公正以及有效管理。通过舆论场发出媒体正义的声音。

第三,选择公众关注度高、适合多方参与的问题,通过媒体平台,发挥媒体社会动员和整合的作用,鼓励更广泛的社会成员参与讨论和发表意见,主动联系政府部门和社会机构共同参与沟通。在此过程中,媒体本着公平公正原则,求同存异,让所有参与方学会通过磋商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最终每一位社会成员都能不同程度地发挥积极作用。

第四,尝试媒体社区项目,先选择一些操作性强的教育项目(如美德教育),将新价值观和道德准则介绍到社区,联合政府部门和其他社会机构一起运作。积极鼓励所有社区全员参与,开展社区公共问题磋商和集体决策的实践。采用“行动——反思——行动”模式,不断检验和校正行动的社会效果。对此项目的实施情况进行全程关注和报道传播,并将试点成功案例进行有计划地社区推广。

当然,要实施这些想法也面临很大挑战。首先,新价值观和道德准则方面的教育,对很多人来说是新鲜事物,需要一个了解学习和实践探索过程。同时,这类项目的全员性更是需要进行大量人力资源培训,包括媒体从业者、公众和政府官员等等。其次,鉴于中国的具体国情,主流媒体涉及灵性教育和社会道德教育时,应该以道德原则为主要切入点,自然和切合实际,让积极的成果来证明新的道德重建对社会文明的推进作用。

结语

媒体功能的失衡与修正,以及媒体对人类社会精神道德重建的使命,都必须要有灵性价值观和符合当今世界发展的道德准则来引领和支撑,如人类一家、公平正义、科学与宗教同

²¹ 阿博都巴哈:《巴黎谈话》,澳门:新纪元国际出版社,2009,第119页。

²² 《毁灭或世界新秩序?》,澳门:新纪元国际出版社,1997,第35页。

步发展，用磋商方式寻求问题的解决，强化精神道德教育等。而媒体推动的社会灵性道德教育，必须是多元化、多层面、多种参与度的社会活动，必须是全社会每一个组成部分都平等参与和努力的系统工程。如果没有全民共同参与和全力以赴，我们所期待的人类社会的文明与繁荣就不可能实现。